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我不禁想起我与李白烈士故居的一段难忘的缘分……

## 永不消逝的电波

坐落于上海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一幢红砖小楼，如今已挂上了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牌匾，牌匾上的六个大字金光熠熠。这栋老式建筑并不怎么起眼，却又让人感觉到了她的深邃和内涵，每天安静地迎接来自全国各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各界人士。

李白烈士是我党情报通讯战场上的无名英雄。1937年，李白受党中央指派，从延安来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凌晨，正当李白发送电报时，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危急之中，他向延安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这成为了李白烈士最后悲壮的告别。被捕之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李白同志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用生命捍卫党中央，审讯没有任何结果。最终，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往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当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

1958年由李克农同志向党中央提议以李白同志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深受亿万观众喜爱的电影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继承革命烈士遗志，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身。

可不知什么原因，李白烈士故居这样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还被埋没在上海一条普通的里弄里，而李白烈士遗孀裘慧英女士和儿子李恒胜还未被人们所知晓。

1983年年底，在虹口区宣传部，档案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虹口区不仅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34处名人旧居，还有革命历史遗址，如党的“四大”召开地、《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烈士的居住工作及被捕地，当时作为虹口区团委书记的我听闻这一席话后心里便起了涟漪，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踪迹，建立李白烈士故居供后人瞻仰就成了我敬仰先烈的初衷。我主动向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时任区文化局局长张乐竺和团区委书记张永林对于我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我便开启了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旅程。



# 寻找「李白烈士故居」

◆ 吴德胜



本版插图 杨宏富

## 裘妈妈流下了泪

通过居委及派出所的帮助，我很快联系到了李白烈士遗孀裘慧英女士。由于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政策未全面落实，当时裘女士尚未被好好安置，只是居住在虹口区四平路邮电新村的老式公房里。

前去拜访之前，我认为烈士的家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拜访后才发现裘慧英的家再普通不过，虽然在邮电局工作，但裘女士家连一台电话机都没有安装，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简朴而亲切：矮小的身材，留着传统的齐耳短发，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

我开门见山向裘慧英表明了来意，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支持。裘慧英听后，急忙放下手中正在为孙子打的毛衣，关掉了收音机，激动地向我回忆起了当时李白烈士的工作生活，直至最后被捕的情景……

她从五斗橱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了用绒布包裹好的李白烈士牺牲前从监狱内托人写给她和儿子的信。顿时，我感觉空气凝固了，我真不敢用手去接这沉甸甸发黄的“宝贝”，生怕弄破。我粗粗地看了一下，落款处写着“静安”两个字，我怕我错过了，刚要开口问裘女士，她不愧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马上看出了我的疑惑，她说道：“哦，当时隐蔽在地下工作的同志都不能用真名的。”

接着，裘慧英又讲起了李白被捕时她也被带到了警备司令部，她和李白被分别关在隔壁两个房间进行严刑拷打，只听见隔壁李白的惨叫声，自己的痛都不知道了。后来一个女特务把她带到李白处看着他受刑，想叫他这个“小姑娘”如实招来。裘慧英看着李白“吃老虎凳”、“拔指甲”、“上电刑”时，非常难受。李白昏死过去后，她对着敌

## 纪念馆正式建立

离开裘妈妈家之后，我内心满怀着对李白烈士的敬意。忘记这段历史，就对不起为新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啊！

第二天我比约定时间提早了十分钟到，只见裘妈妈已在和当时居住在底楼的居民聊起了家常(事后获知裘妈妈已在前一天晚上来过这里说服居民请假半天等我前来)。裘妈妈陪我走上三楼，虽然已经搬离了几十年，但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居住的场景。

再上几步楼梯，一个只有三四个平方米的小阁楼呈现在我的眼前。所谓小阁楼，连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直不起腰来，更何况是李白烈士这个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每天深夜爬进爬出地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又是上海联系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真是有点难以想象。

1984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5周年之际，故居正式建立之前，虹口区团委首先开展了“各界青年瞻仰李白烈士故居仪式”，进行了挂牌。当时的挂牌材质很简单，是在房管所找来一块60厘米左右的木板，漆上白漆，木牌名由一名团员书法爱好者王九华题写。一年后的5月28日，由虹口区青少年自愿集资捐建的李白烈士浮雕落成，浮雕以电波和宝塔山为背景，突出表现了李白烈士的光辉形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吴邦国等在浮雕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同年11月13日，“李白烈士故居”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大叫一声：“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敌人也把裘慧英打昏过去了。

上海刚解放时，她抱着儿子到处打听李白下落的情形，报上所有刊登有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她都去找过，普善山庄100多位烈士里没有李白，虹桥路70多位烈士也没有李白，宋园17位烈士里仍然没有。最后，在蓬莱路警察局的一个看守处得到了消息：5月7日晚上，有一批被捕共产党员被送到浦东去了。她马上赶到浦东，一路上到处询问当地老百姓，最后在离上海几十里路的杨思区戚家庙才找到了12名就义共产党员的遗体，她一眼就认出了李白……此时，裘慧英已经说不下去了，并流下了眼泪。

“裘妈妈……”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至此之后，直到1992年3月30日裘慧英去世前，我一直亲切地称呼她为裘妈妈)。当时我这个20多岁的小辈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眼前这位革命老人，只能说：“您喝口水，慢慢讲。”“哦，我还没给你倒水呢，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记性。”我马上抢过热水瓶，倒了两杯开水。

片刻，她缓缓地说还有人能够记起她的先生李白，青年人要是为他建纪念馆，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最后，她又给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是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时，饰演女主角的袁霞同志住在她家里与她同吃同住，学着她的一举一动，到拍摄时，裘妈妈自己则客串演“群众演员甲”，站在女主角旁边当一个纺织女工。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已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我只能告辞，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和裘妈妈去黄渡路现场走访一下。裘妈妈让我再等一下，拿出她和李白的合影，在背面处写上“赠吴德胜同志”，并签了“裘慧英”姓名。

虽然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还居住着三户居民。怎么供后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虹口区政府的牵头下，我先后联系了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分别得到了时任局长丁升烈、徐志超的大力支持。经商议，由上述三家单位联合出资迁三户居民，恢复并建立“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

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是，三户居民对重建李白烈士故居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热情，他们说自己是看着《永不消逝的电波》成长的，居然不知不觉在这光荣的地方住了三十多年，真是无比自豪。据说这三户居民都有亲人在解放前参加过革命工作，所以都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在得到住户的支持后，我的干劲更足了，不到一年时间，修缮一新的“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正式建成了。材质上乘的柳安木上镌刻由陈云同志亲自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1987年5月6日，值李白烈士牺牲38周年纪念日，“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正式建立并迎来了首批参观者。如今，“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400来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接待来自本市和全国各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观者30万人次。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李白同志离开我们已65年了，裘慧英同志也去世22年了。今天，我们过着自由而幸福的生活，这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好好珍惜它，学习和继承烈士们的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小区附近有个综合型菜市场，有一家专卖葱油饼的摊位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天从清晨六时起这里总是围着一群人，从不间断，有时还排起了长队，而且已好几年了，还上了上海电视台的“人气美食”。我好奇：是什么原因吸引了如此多的顾客，而且天天如此呢？初夏的一个晚上，我约年轻的摊主在附近的一个茶室，谈谈小小葱油饼背后的故事。

他告诉我，他叫李进，熟悉的都叫他“阿进”。安徽人，今年刚好三十岁。五年前他来到上海想创业，做什么没有方向，便到处跑、打听。一天早上，他发现，卖早点的摊位人很多，其中葱油饼尤其吸引了他。葱油饼，在老家既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吃过，于是就买了一个，一吃，又香、又酥。特别是做饼的过程更是好玩，一团面粉，一揉、一卷、一压成型，不到几分钟，一块香气扑鼻的葱油饼就做成了。他足足在旁看了个把小时，回到住处，久久难忘，决定学着先试做一下。

看看挺简单，但如何配料加工不得而知。凡是打听到有卖葱油饼的地方，就去看、品尝。头两个月，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了不知多少家卖葱油饼的地方，不知吃了多少种味道的饼。有几次因为老是盯着人家看，还招到了训斥和驱赶。最后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才了解到做葱油饼的一些基本知识，随后租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创业之路。

聊到这里，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为什么你不去做家乡特色点心，而去做根本不熟悉的上海本土点心？”

阿进回答：“到了上海就要融入上海，这叫入乡随俗嘛。”而且他发现，而今这些传统特色点心却逐渐减少了，特别是价格低的东西，做的人越来越少。上海人不做，只有我们外地人来做。

要做，就一定要原汁原味，保持老上海的味道。刚开始半年中，由于缺乏经验，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内芯生了、一会儿外壳焦了，生意也一般般，一天卖不了几十个，差一点半途而废。关键时刻，儿子的创业得到了父母亲的倾力相助，他们来到上海当助手。结婚不久的媳妇也辞去工作来到了身边。一家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和拌面团，剥洗香葱，每锅六分钟，三分钟煎、三分钟烘，生意再好，从不断少环节……

阿进的葱油饼越做越火红，现在每天一千多个，仍供不应求。阿进说：“每天大约有一两百人因买不到扫兴而去，但第二天仍会再来。”我好奇问他，为什么有生意你不多做一点呢？阿进笑着告诉我，这叫“控制总量，保证质量”。做多了，和的面、葱和油酥第二天就不新鲜了，味道就不对。宁可少做些，但味道永远不变。哦！听了阿进的话，我知道所谓的“上海味道”就在这里。

有了好的品质，诚心服务也很重要。阿进的摊位离人行道要走上好几个台阶，每逢下雨天，只要看到有年迈、走路不方便的老人，阿进都会走出去搀扶一下。有一位老客户是阿进葱油饼的“粉丝”。后来身体不好，行动不便，阿进知道后，隔三差五地每次七时下班后，将最后一锅三个热气腾腾的葱油饼送到老人家里，一干就是一年多。老人感谢万分，与阿进成为忘年交。

结束交谈时，我问阿进，做了五年的“葱油饼”，每天12个小时工作，累不累，是否想做做其他？阿进说：“与我同龄的老乡在上海做房产、物流、装潢、汽车销售都有，既体面，收入也不少。但是五年来我对葱油饼已有感情了。一是创业一路走来不容易、要珍惜，二是每天见到这么多熟悉热情的顾客觉得很温暖、很开心。电视台两次上门来采访，我有了小小的成就感，再苦再累也心满意足了！”

面对这个年轻人，我心里由衷感到钦佩和感慨。社会需要成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白领，同时也需要千万个像阿进那样的默默无闻地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服务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

# 阿进的葱油饼梦

◆ 关鸿